

# 关于中国古代新闻思想发展研究

何 微

中国新闻学有组织的研究,开始于1918年10月14日,经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倡导,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该会以“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发展为宗旨。”在20世纪初,研究会以发展我国新闻事业为目的,可见蔡元培深谋远虑,目光远大,真是难能可贵。时间正在“五四运动”的前夕,对于中国人民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研究会作为新兴的事业,其成效是显著的。研究会聘请了著名新闻学者徐宝璜,名记者邵飘萍任导师,培养了一批新闻人才;建设学习园地,出版《新闻周刊》;编撰了我国第一部《新闻学》专著和我国最早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也为北京大学后来政治系、哲学系开设新闻理论课程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这是我们较早的师承,系统的理论性经验的积累。

关于我国新闻历史学的研究,发轫较晚,最早的是戈公振所著《中国报学史》,出版于1927年。这本书是戈公振全面、系统论述我国报纸发展历史的力作。戈氏在《自序》中说:“予维报学(Journalism)一名词,在欧美亦甚新颖,其在我国,则更无成书可考。无已,故取关于报纸之掌故与事实,附以己见,编次为书。”虽然对此书至今还存在不同的评价,但我认为,平地起楼台,树于华夏,开我国一代新闻史研究的先河,该书资料丰富,论证谨慎,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至今研究者不衰。《中国报学史》解放前曾印过四版,建国后曾重印过一次,戈宝权校正后又印刷过一次;1982年台湾学生书局也有一个印本,增加了不少插图。由于戈氏为国民大学授课任务紧迫:“时未越岁”完成一本巨著,已够说明其价值了。如果求全责备,恐怕就不公平了。社会历史是一条漫长的过程,不断在前进。新闻历史也不例外,有它发展的阶段性和时代局限性,我想这是不能违背的客观规律,何况是我国首创的一部报学历史呢!举例而言,如果我们写当代新闻事业史,过多少年之后,历史大大向前推进了,我们的后代同样会以“受时代局限性”的话来评价我们著作的不完备性。

中国新闻史学的研究,最初重点放在报学方面是完全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因为那时我国还未设立广播电台、电视台,新闻教育也在襁褓之中,以研究报纸发展历史为中心是必然的。所以戈氏在书中不仅提出“报”的定义,“报纸”的定义,进而提出“报学史”的定义。他说:“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这个实质性定义,揭示了事物的特有属性。

我国研究新闻史学,对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研究取得较好的成绩。解放前已经引起研究者的注意,1942年,开明书店出版过章丹枫写的《近百年来中国报纸发展及其趋势》。解放后,我国第一本新闻历史巨著是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两册,57万余言,1981年出版。萨空了在序言中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读他的著作,深感它确是对当代青年了解过去这段

史实极有益的出版物。他博览这一时期的新闻史料，广征博引，持有自己的观点，在写作中随新时代的发展还能改正自己的看法，这都是很难得的。”后出的(1983)复旦大学李龙牧所著《中国新闻事业史稿》，他坚持新闻事业与政治不可分割的原则，采取史论结合，进行阐述，又能尊重新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失为一本比较好的新闻史教材。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如史料匮乏，或是一些史料分散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收集查阅都遇到困难，致使古代新闻历史研究呈现出一种荒芜现象。可读的古代新闻史专著仅见黄卓明的《中国古代报纸探源》一书。他严肃治学，下过一番硬功夫，对史料做了认真考证，全书仅12万5千多字，论述是比较准确的，对争论已久的许多分歧意见，作了肯定的回答。

不论从宏观或微观上考察，对新闻史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都作了超越前人的工作，不论对新闻史的框架结构设计，对某个时代新闻史学问题的深入探索，对新闻界名人新闻思想的系统分析介绍，以至对某个有争论的问题的追本溯源，这一切是发生在正经历迅猛而深刻变化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土地上，其意义是多么重大啊！

作为一门已有深厚基础的新闻历史学科，似乎研究工作已到了尽头，1984—1988年还出版过几本新闻史，内容与前出者已大同小异，无新的进展。综观研究工作的实际，很有益处。中国新闻历史的研究，基本上有三条发展主线，它都具有一定的体系和反映体系内容的形式。

第一条是以中国报学史为主线的报刊史。戈公振是报史的拓荒者和奠基人，距《中国报学史》的出版，已经过去60多年，后出的几本有影响的新闻史著作并未离开以报为主体，而且主要论述的是近代报纸的产生与发展。著作都提到古代新闻事业，具体称谓是“古代报纸”、“中国早期的报纸”、“中国最早的报纸”，所占篇幅有限，少的几段，多则2、30页，分量轻而又轻，与我国新闻传播历史发展实际极不相符，这是由于受一个“报”字的制约，大抵是从“邸报”说开来，认为“邸报”是中国报纸的源头。

第二条是以新闻界人物传略为主线。胡太春著《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书名很吸引读者，顾名思义，应是一本近代新闻思想发展史，实际是一本新闻界人物传略。其优点是将新闻界主要人物的新闻活动都涉及到了，简要为其特点，不失为一本有价值的读物，不足之处是新闻思想枝节横生，缺乏概括和综述。它与《新闻界人物》比较，就不如这部多卷本传略详尽、系统，社会评价高。关于新闻界人物传略散见于新闻学刊物的也不少。研究新闻历史，其价值就反映在新闻界人物思想和其新闻活动上，史从事出，论从史出，写新闻史，少不了新闻界人物的活动和重大新闻事件，没有人和事件就没有历史，恩格斯曾经讲过：“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

第三条是以新闻事业专业史为主线。1987年出版了韩辛如的《新华日报史》(1938—1947)，以及刘云来写的《新华社史话》、杨居人写的《拂晓报史话》。抗日战争中在解放区有影响的大报，如延安《解放日报》史，华北《新华日报》史，《晋绥日报》史，《大众日报》史，这些只有一些片断的回忆。范长江、胡愈之主办的国际新闻社的史话，也属于这一类著作。广播史及电视史，也因无总撰稿人和科研经费，长期不能成书。肯定说，开始雄心勃勃，久而久之，便无人过问，实在可惜。

以上三条主线，许多专家学者所努力得到的成果都为社会所承认，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三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粗略的中国新闻史学的轮廓尚是清楚的。

但我认为，还有一条不可缺少的主线，即中国新闻思想发展史，由此接触我们从未深入研究的科学领域，又可指导新闻史学研究的门径，对悠久的新闻思想发展成果进行初步的总

结。

以下，本文仅就关于如何研究新闻思想发展历史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 (一)

研究中国新闻思想的发展，及其深远的影响问题，具有世界意义。由于我们论述的不正确性，已经影响到国外学者，把我们不正确的论证进行转述和引伸。如英国历史学家安东尼·史密斯认为，中国早在汉代已存在新闻通讯机构，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现在仍旧找不到这种史实与实物以说明这个论述的确凿性。

作者论述的古代新闻思想发展问题，不是为“邸报”或“邸”作注释，而是论述被认为是新闻传播规律以及与其相联系的新闻思想发展的因素及成就问题。

在这里，所谓的新闻思想，不是头脑中随意创造的产物。恰当地说，思想是现实在意识中的反映。对思想的实质及其产生的根源，要到社会制度中，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中，社会的各种存在中去探求，因为任何思想，都与社会存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对存在的反映。同样，新闻思想也是存在的反映，违背了这个基本点，就不是唯物主义者。

本文论述中国古代新闻思想的发展，首先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最重要方法论原则，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指导认识我国古代社会的新闻思想发展的历史，因为它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只有真实反映客观现实规律时，才会是正确的，科学的。谁通晓了客观规律，谁才会正确地对待社会存在的一切现象，才能正确地研究新闻史学。

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中国古代新闻思想发展，必须承认人类社会及其新闻思想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物质基础。显然，脱离物质基础就不会有新闻传播思想的产生，最原始的新闻活动也是如此。

其次，是历史的观点。我们都承认人类新闻思想的产生与传播活动，随着人类新闻事业的发展蒸蒸日上，但在历史的前进中，在从最早的、最初的、极为简单的新闻传播思想活动到现代复杂的新闻思想的运动形式，这也是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研究的内容，也是它的起点。因为新闻思想是在历史继承中发展的。

再次，应该把新闻思想的发展视为社会的有机体，它存在于具体的区域、民族和国家之中，它不可能是孤立的，而是与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联系在一起，可以保护它，发展它，以至限制它。先民们创立了新闻思想和新闻传播活动，促进了社会进步，而新闻思想和传播活动又影响着人类的生活，人们依赖新闻思想及其传播，是客观的需要。

最后，要研究新闻思想发展历史内涵的本质特征，及其自身内部变化发展的规律，这是寻求作为新闻思想发展所固有的东西，将古代新闻思想置于整体中考虑。

在我提笔的时候，已经意识到，研究新闻思想发展的规律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实际上也不可能，它本身也是不间断的发展过程。甚至象研究中国古代新闻思想发展，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它的发展涉及面广，时间已经过去，从旧石器时代初期绝对年代距今约300万年至100万年。文献不足，即使获得某些古代文献资料也必须进行严密的鉴别，去伪存真。无可奈何，一些学者只好举摩尔根、普列汉诺夫书中的事例解释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现象。我们承认世界新闻思想和传播活动的共同性，但并不排除它存在着无穷的多样性。用外国的个别事例来引证中国原始新闻传播活动恐怕不妥当。

作者深信，新闻思想的产生、传播活动最重要的源泉和因素是不能超越历史的不变的力量

量，在每个社会范畴和社会形态中，它们的表现是不尽相同的。

## (二)

自有人类以来，就产生了新闻思想和新闻传播活动，而且人类的新闻传播活动从未停止过，它是由低级到高级发展，受到新闻思想的支配。

原始人出现时，就是以群而居，这种生产关系面向自然界，最为简单，采集果实，猎取野兽，打制粗笨的石片劳动工具，或因灾害的侵袭，为生存而迁徙，以及这个原始群向那个原始群夺取生活资料而进行的械斗。凡此种活动必须整个原始群协同一致才能取得成功而生存下去。因为原始生活的环境，不断的急骤变化，要生存就必须了解外部情况，应付突然变故，由此产生了解外部世界的新闻思想，进行必要的传播活动，使原始群的行动与客观世界的变动相协调。这一点是众所公认的。

问题在新闻史学者们，从未提到新生代第四纪更新世，即2、300万年前，自有人类以来的新闻思想和新闻活动。是没有吗？人类历史已作了肯定的回答：有。

山西、陕西两省，50年代接连发现了古文化和古人类遗址，为研究旧石器时代初期的新闻传播活动提供了较多的依据。

典型的遗址有四处，它们是山西芮城县西侯度遗址，陕西省蓝田县公王岭蓝田猿人遗址。和陈家窝子遗址，以及山西芮城县匭河遗址。除陈家窝子未发现有代表性的文化遗物外，其余三处都发现大批属于旧石器时代初期的石器。通过这些石器的打制方法和石器类型等，可以探索到山西、陕西两省旧石器时代已有新闻传播活动。

我们认为石器文化的共同性是由传播活动而形成。它表现在以下三点：

一、上述各地点的石器文化，主要以石片石器为主。就连其它省份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初期的遗址，也都反映出以石片石器为主的文化。这是基本的共同特质。

二、三个遗址，还有用相同的方法打击石片。一种是用锤击法直接从石核上打成石片。这是三处文化所共用的方法。锤击石片一般都薄而长，台面和石片角较小，打击点清楚，半锥体集中。一种是砸击法，在西侯度和蓝田猿人遗址中都有发现。使用这种方法生产的石片，上下两端均可见到剥落碎屑的痕迹。另一种是在西侯度和匭河遗址中，有用碰砧法生产的石片，碰砧法是一种生产较大石片的方法。一般宽大于长，打击点散漫，半锥体常双生。

三、古文化遗存，在西侯度，蓝田猿人和匭河文化中，还不仅打击石片的方法相同，而且生产石片所用的石料也相同，绝大多数使用石英岩。

这三个文化中，最富特色的打制工具是三棱大尖端器，是由一个三面三缘的尖形石英岩、砾石加工而成，加工限于尖端，在原料、器形、打制程序上十分一致。

另一富有特色的共见石器是石球。这在蓝田猿人遗址和匭河遗址都有发现。在我国有些文化遗址中出土很多，数以千计，这说明石球在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中，成为人类生产、生活斗争中的重要工具之一。

不惜使用这多篇幅阐述三遗址的古文化情况，目的是想为人们清晰地看到石器性质与诸文化的关系。毫不用怀疑，三个遗址的关系十分密切，既用同类方法打制石片，又有同类型的石器。尽管三个遗址的地质时代早晚不同，技术水平也有高低，却仍然可以看出彼此之间的传承关系(即传与受的关系)。

西侯度文化，蓝田猿人文化和匭河文化都属于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传统，它

们的发展脉络清楚,传承关系明显,而且三棱大尖器将这三种文化连结在一起。考古学者认为,蓝田猿人的某些石器源于西侯度石器,传承关系非常密切,而三棱大尖状器和石球,又把蓝田猿人文化和匭河文化的垂直关系连贯起来,匭河文化是由蓝田猿人文化发展而来。

这种联系决非偶然现象,那时人类的智力和技能相当低下,从地理环境上也不连在一起,山西的芮城到陕西的蓝田,东北至西南划一条直线,约有150公里,何况有一条黄河天险及渭河相隔,途径处处有高山和狭谷,如果没有人际交往,思想传播、新闻交流,在石器工具生产上如此一致,那是不可想象的。我大胆地断定,在2、300万年前的更新世,人类已有了新闻传播活动。

中国有文字要早于殷商的甲骨文,西安半坡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钵口沿上常有一些刻画符号,而且这些符号在4、50种彩陶器上重复出现,部位特定,考古学者认为是原始人对某些事物的标记,也有的认为是我国文字发展的渊源。有实物说明在公元前5000—3000年已经有原始文字出现,而且首先使用于记载事物。

最有趣的是甲骨文,它是商周时代刻于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在河南安阳出土的称为“殷墟甲骨文”,在陕西周原出土的称“周原甲骨文”。刻于这些甲骨上的多属于占卜辞,在甲骨学上通称为甲骨卜辞。甲骨卜辞的结构与我们当今新闻的要素完全吻合,仅是称谓不同。完整的卜辞由“前辞”(亦称“叙辞”)、“问辞”(亦称“命辞”)、“占辞”、“验辞”四个部分组成。“前辞”是写何时、何人(何人多数是指贞人或商王);“问辞”是所要问卜的事物,即新闻要素中的何事,何地也一般包括在这个部分;“占辞”为占卜预测的事,这点与新闻中的何故相同;“验辞”为占卜的结果或应验情况,也就是新闻要素中的如何。举一条殷墟卜骨文字就可更好地理解。文如下:

壬午卜。贞,王田柞,往来无灾?获鸟百四十八、狸二。

如用现代汉语写这则新闻,大意是如此:“壬午这一天,贞人占卜,商王去柞这个地方狩猎,是否会遇到什么灾难?结果收获很大,捉到148只鸟和两只狸。”这则卜辞不论依卜辞的结构还是用新闻要素来衡量,都合乎要求。

关于新闻要素,有的新闻学者认为:其来自西方,最早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并说《上海报》在1929年才以新闻五要素教育自己的通讯员。其实我们的先人,早在3000年前,在从事新闻性的写作或记事中已自觉地使用了新闻写作要素,这标志着我国从那时起,新闻写作已逐渐成熟起来了。只因为殷商时代尚无“新闻”一词,当然就不可能提出“新闻要素”的概念。但自觉在写作实践中运用它并遵循其规律,则说明了这种新闻思想的客观存在。所谓新闻五要素来自西方的思想,我以为应予否定,坚持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才是正确的态度。

今天的新闻,明天就是历史,新闻积累成历史,历史又再现了新闻事实和其价值,谁企图将它们分开,就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面在反对它。

中国最古老的历史专著为《尚书》和《春秋》。《尚书》所记是虞、夏、商、周四世的历史,其中特别保存了商周时期的珍贵史料。在这同时,标志一个历史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同属有新闻价值的史实记载。但要比甲骨文更近于新闻陈述的要求。

《尚书·牧誓》是周武王灭商,大军到达商郊附近牧野的地方时的战前动员令,也是一篇很出色的通讯范文。全文不过250字,写得气势磅礴,有声有色。从新闻角度检验,其时间、地点,周武王率领的三卿将帅,助战的8个属国,以及灭商的缘由,勉励士卒勇武善战,又不要杀害来投降者的战场纪律,十分详尽。由此可见在3000年前,关于新闻记述的要求和思想已基本形成。

据多次通读《春秋左传》认为它是一部古代新闻作品选集。《经》属要闻，《传》是有背景的解释性的报道，我这样讲的根据是：

（一）及时性：晋灵公十四年（即鲁定公二年，公元前607年），晋卿赵盾因避灵公杀害而出逃，未出境，他的族人赵穿在桃园杀死灵公。太史董狐认为责任在赵盾，就在简策上记载说：“赵盾弑其君。”写完之后，立即拿给朝中人看。

（二）准确性：鲁隐公十一年（即公元前712年）十月，郑庄公率虢军攻打宋国，壬戌日大败宋军，这是报复以前宋国入侵郑国的旧仇。但是宋国并未派使臣来鲁国告急，所以《春秋》才不记载这次战役，因为经文的写法有一条原则：“凡诸侯有命（指发生的大事和发布的政令），告则书，不然则否。”《春秋》记载的史实不是道听途说，须有准确的新闻来源。

（三）选择性：《春秋左传》中凡与百姓有关的事物也有不少记载。如鲁庄公二十九年（即公元前665年）“秋，有蜚，为灾也。凡物不为灾，不书。”又如鲁隐公九年（即公元前714年）“夏，城郎，书不时也。”意为鲁国修筑郎城，经文所以要记载这件事，说明这项工程正值农忙季节，是很不适宜的。

（四）简洁性：如鲁庄公十七年，“冬，多麋。”鲁桓公三年，“有年。”意即粮食丰收。有的记事仅用一个字，如隐公五年，“螟”。是指这年秋天发生螟虫蛀食水稻、玉米等作物。

（五）正误性：如鲁僖公十五年（即公元前645年），“夏五月，日有食之，不书朔与日，官失之也。”

（六）连续性：这种连续报道多属重大事件。如鲁桓公十八年春，他携带夫人文姜到齐国访问，发生齐襄公与文姜私通的事，齐襄公又指使彭生将鲁桓公捏死在车内，后来两人肆无忌惮，齐襄公与桓公夫人往来幽会。从桓公十八年至鲁庄公七年，在《春秋左传》上记载有七次之多。

（七）《春秋左传》记事，用字非常严格。而且还趋向规范化了。虽仅一字，但看了就知道指的什么。如鲁庄公二十七年有一则记事：“冬，杞伯姬来。”是指她回到娘家鲁国。非诸侯的女儿回娘家叫“来”；因离婚而回娘家叫“来归”。诸侯夫人回娘家叫“如某”；因离婚回到娘家叫“归于某”。

我认为《春秋左传》是我国古代的新闻作品选集，并举出七端进行论证，并没有将《春秋左传》中的新闻思想说尽，如可信性，这是孔子仆仆风尘周游列国而未被重用，回到家乡以《鲁春秋》为蓝本，增其所见所闻著为春秋时代列国编年史。一者，古代统治者，设有史官，王侯的一举一动，当时就记于简策，孔子可作根据；二者，孔子对待史实非常谨慎，他自己也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三者，孔子还抱有这样的观念，如写一些空言，不如讲些实在的事，易于使人明白其中的道理。由此足见我国新闻思想的萌发与逐步形成，时间久远，在此思想指导下编成的《春秋》命名为中国古代新闻作品选、作为新闻学的一门课程，以阶级方法研究分析，绝不是牵强附会，毫无根据的狂言。

舆论起源久远，《淮南子·主术训》中曾记述有一段传说：“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让百姓议论是非，指责过失，讲述建议。《虞书·舜典》写道：“五载一巡守，群侯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其大意是说天子五年有一次巡守，四方诸侯四年中分别来朝一次，上下交换情况，并各陈他们治国的意见，考其功迹，赐以车服。这说明部落的领袖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已经注意到舆论对于治国的重要，以民意依旧。

舆论源于“舆诵”，是指众人的言论，如《春秋左传》中僖公二十八年：“晋侯听舆人之诵”。

《国语·晋语》中有：“惠公入，而背外内之赂，與人誦之”。

另一舆论来源，古有献诗、陈诗、采诗之说。《国语·周语》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瞽赋，矇诵。”《小戴礼·王制篇》有：“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何休《公羊传》注中说：“五谷毕，人民皆居宅，男女同巷，相从夜绩。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以闻于天子”。

春秋时代，郑国的著名政治家子产，积极主张郑国人民议论政治。《春秋左传》鲁襄公三十一年：“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子产这番话讲得非常得体，重视国人的意见，修改他的政策，以民间的批评为他纠正错误的药石，所以孔子也很赞赏他。

研究先秦的舆论问题，综观《春秋左传》、《尚书》、《国语》、《战国策》、《小戴记》、《大戴记》、《诗》和《吕氏春秋》等有关的许多篇章，中国古代的舆论学已见雏形，而且以诗谏，史谏和礼谏为特色，包括君民两个方面的内容，有许多生动的事实记载。归根结底，它是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但不妨碍我们的研究，这些已收入我主编的《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研究文集》初稿的古代部分，试图为写中国古代阶级社会舆论学做资料准备工作。

### 〈三〉

中华民族的文化辉煌灿烂，古代新闻思想发展和传播活动只是民族文化发展中的一个局部。人类社会由无阶级的原始社会进入到阶级社会，都受社会经济形态制约，特别从意识形态方面考察，关于新闻思想和传播活动，在有阶级社会，基本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例如《邵公谏厉王弭谤》，虽然邵公提倡要让百姓讲话，所谓“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其目的仍为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当人民起来反对周厉王时，厉王的儿子宣王逃入邵公的住宅。《国语·周语》中有几句话很可以说明问题的实质。邵公说：“夫事君者险而不怼，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宣王死，这就对奴隶社会的舆论本质揭露无遗。

本文只写到先秦，着重陈述了许多事实，说明我的见解，以引起新闻学者与新闻教育家们的兴趣，注意研究它。我无意将我个人的观点强加于任何人，因为这些意见也不完全成熟。

汉、唐、宋、明、清的新闻思想和传播事业，比先秦的史料丰富得多，但是争议的问题也多。汉代是否有“邸报”；唐的“开元杂报”是否属于报纸，并用雕版印刷；现存最古老的邸报是否是在英国不列颠图书馆的“敦煌邸报”；新闻史是否就是报刊史；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传播情况怎样；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新闻宣传的揭露还是一个空白，等等，有的分歧意见较大，有的尚属阙如。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已有著名的新闻史学学术带头人，我殷切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准确地、系统地、分支清晰地编写成一巨册——中国新闻发展史，作为世界公认的信史，献给人民。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于珞珈山

（本文责任编辑 车英）